

沈从文当和事佬

■ 刘浪

梁宗岱向来好争辩。1937年3月,他在《宇宙风》杂志第36期上,发表《从滥用名词说起》。文章批评了他的两位好友,指出朱光潜《文艺心理学》中说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“温柔委婉,如怨如诉”,这属于望文生义,因为贝多芬原本表现的是“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”。还有李健吾《咀华集》评价何其芳的散文集《画梦录》,说读《岩》好像“谛听一段生风尼(交响乐)”,显然也不准确。

对此,朱光潜没有回应。李健吾却写了《读〈从滥用名词说起〉——致梁宗岱先生》的长文,发表于当年4月2日《大公报·文艺》。他承认“生风尼”确系用词不当,但梁宗岱自己也滥用名词。

4月28日,梁宗岱又在沈从文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上发表《〈从滥用名词说起〉底余波》,副题“致李健吾先生”,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和巴金。因梁实秋在《文学的美》中说,“美学的原则”可应用到图画音乐,偏偏不能应用在文学上,遭到梁宗岱的揶揄和痛骂。同时,梁宗岱表示,他赞成朱光潜对达·芬奇《最后的晚餐》是油画的论断。

一个多月后,巴金在上海的《中流》杂志上发表《给朱光潜先生》,证明《最后的晚餐》并非油画,而且朱光潜关于“世纪病”的翻译很不恰当。

眼看论争变得越发针锋相对。6月30日,沈从文用笔名“上官碧”发表《滥用名词的商榷》一文,以和事佬的姿态,提出两个观点,作为总结:一是滥用名词不可避免,不应过于苛责,即便要批评,双方也应心平气和,不能像梁宗岱那样“吵吵嚷嚷”;二是个别名词的使用不当,不会决定文章的整体成败,但首先写作态度必须是诚实的。至此,这场论争才逐渐平息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在古代,他们是这样过年的

■ 吴辰



国画中的诗人高适。



《乾隆帝岁朝行乐图》中的乾隆皇帝。



李士达《岁朝村庆图》中放爆竹与敲锣鼓的场景。

转眼间,春节将至,来来往往的旅人们将过年的气息带到了全国各地。当欢乐的心情乘上了汽车、火车或者飞机,即使是有千万里的距离,人们也并不觉得遥远。这不是错觉,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交通的便捷,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使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成为轻而易举的旅程。然而,在古代,因为交通工具以及道路的限制,人们过年回家,真的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。

其实,在古代,大多数的人都无法在春节按时回家,他们或是在旅途中,或是在谋食处,望着日夜思念而终究回不去的故乡,一支笔、一首诗、一封家信可能就成了这个时候捎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

唐代开元年间,在镇江的北固山下,秀丽的风景和新年的喜庆相得益彰。在一家旅馆里,一位来自洛阳的客人却正在书写着他的乡愁:“客路青山外,行舟绿水前。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?归雁洛阳边。”他叫王湾,一生醉心江南风物,曾往来吴楚之间,在辞旧迎新之际,他无法

回到家乡,即便坐拥这南国美景,也免令人心生惆怅。于是,便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诗。青山绿水也挡不住满怀的乡愁,舟车劳顿只为一年的生计。人们无法确切地考证出王湾为什么这年没有回家与亲人们团聚,但是他在诗中表达的对故乡的怀念却穿越了时代,感动着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。

和王湾有同样心境的还有高适。有一年,这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送兵至蓟北,任务完成后,南归的马蹄却怎么也追不上新年的步伐,他只好在蓟北一家旅馆住下。此时的高适已经年近五十,无意间向镜中一瞥,

发现自己两鬓已经斑白,于是,他提笔写下一首诗:“旅馆寒灯独不眠,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这首诗的前两句平平无奇,可是到了第三句却峰回路转,诗人回顾自己的一生,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远方的故乡,今年在这萧索的边塞,故乡是回不去了。可是明年呢?明年是否能在春节回到家乡呢?

一个“又一年”意味深长,也许,对高适这样终日为国家奔走的人而言,回家过年是一种奢望,明年诗人的白发也许会更多,而明年新年的故乡依旧会很遥远。

当然,并不是每一个在新年之

际仍漂泊在外的羁旅之人都会触景伤怀,另有一些新年无法归乡的人们对新年满怀希望,斗志昂扬。明代正统年间,名臣于谦因镇守太原而无法回到故乡杭州。北方的冬季苦寒彻骨,于谦却在这苦寒中写下一首鼓舞人心的诗歌:“寄语天涯客,轻寒底用愁。春风来不远,只在屋东头。”这首诗题为《除夜太原寒甚》,但这“寒甚”在于谦看来也只不过是无需发愁的“轻寒”,而即将到来的春风早已在自家房屋东头等着人们了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于谦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为这个寒冷的新年带来了浓浓的暖意。

“春运”的起源



其实,所谓“春运”,并非古已有之。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80年前后,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务工,而春节给这些身在异乡的人们不仅带来了假期,还带来了家乡的呼唤。当“春运”成为一年一度的关键词,当回家不再是一种奢望,这是科技进步的

功劳,更是中国繁荣昌盛的明证——在这片土地上,数十亿人次在此集中的时间里共同完成着一次规模相当于非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人口总和的大迁徙,这正是中国腾飞带来的奇迹。

我国周朝时就已出现春节的雏形,“春运”也就随之产生。那时的

春运,因为交通工具以及道路的限制,比现在要困难。然而,由于那时受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等思想观念的影响,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,距离也不太远。与今天不同的是,古代春运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,而是公务人士和商人。那些外出的谋生者、经商人士,早早就踏上

了返乡之路,避免延误回家的时间。

虽然对古人而言,过年回家的路有些艰难,但每逢春节将至,人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尽力返乡,与家乡父老把酒言欢,一解思乡之情,至于那些回不了家的,也会用各种方式寄托心意,聊慰怀乡之情。

作诗遥寄思乡情



中国自古崇尚礼数,在朝为官者逢年过节都会有相应假期。对于春节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,假期当然要更长一些。以宋朝为例,《宋会要辑稿》中就明文写着春节“假七日”,这分明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小长假。可即使有这样长的假期,官员们想要回到故乡过年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。

在宋代,在地方主政的长官,即

便是在春节也不能离开属地。这当然是为了地方的安全着想。新春佳节,百姓阖家欢乐之时,也正是各类事故高发之日。作为地方行政的一把手,自然要担负起责任,不能玩忽职守。除此之外,宋代在宣布放假时,总会说明“休务”几日,除了“休务”日外,其他时候是要安排值班的。所以,古时候的官员们看似放

假,其实离不开自己的工作岗位。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。有一年,因为值班,苏辙过年只能待在户部。他给哥哥苏轼写了一首诗,诗中充满了抱怨:“七度江南自作年,去年初喜奉椒盘。冬来误入文昌省,连日斋居未许还。”苏辙这是第一次进京为官。他曾经久在江南当地方官,觉得一个人原地过年甚是孤寂,然而此番进京,却发现过年不仅回不了家,而且还要值班,便大有上当受骗的嗟叹。可见,古时候官员们想回家过年有多不容易。

“春运”的从无到有,意味着中国人的“传统”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坐上了高铁、飞机,驶上了高速公路,天涯也不过近在咫尺,旅途虽远却将彼此的心拉得很近。

有假无闲亦枉然

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

便是在春节也不能离开属地。这当然是为了地方的安全着想。新春佳节,百姓阖家欢乐之时,也正是各类事故高发之日。作为地方行政的一把手,自然要担负起责任,不能玩忽职守。除此之外,宋代在宣布放假时,总会说明“休务”几日,除了“休务”日外,其他时候是要安排值班的。所以,古时候的官员们看似放

假,其实离不开自己的工作岗位。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。有一年,因为值班,苏辙过年只能待在户部。他给哥哥苏轼写了一首诗,诗中充满了抱怨:“七度江南自作年,去年初喜奉椒盘。冬来误入文昌省,连日斋居未许还。”苏辙这是第一次进京为官。他曾经久在江南当地方官,觉得一个人原地过年甚是孤寂,然而此番进京,却发现过年不仅回不了家,而且还要值班,便大有上当受骗的嗟叹。可见,古时候官员们想回家过年有多不容易。

“春运”的从无到有,意味着中国人的“传统”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坐上了高铁、飞机,驶上了高速公路,天涯也不过近在咫尺,旅途虽远却将彼此的心拉得很近。

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被

史鉴典录

古代严父

卜庆萍

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被,长176cm,宽116cm。现藏海南省博物馆。

此龙被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。主体图案为“五龙出海”图,龙舞沧海,气势恢宏;外圈饰以花鸟博古图,寓意“锦上添花”。此龙被构图严谨,层次分明,图案生动,色彩丰富,工艺精良,品相完好,为现存龙被中的精品。

龙被,是黎族织锦中的一种,因产地主要在古崖州地区,也称为崖州被,有些地方叫作大被、绣被,素有“广幅布”之称。是黎族进贡历代封建王朝的珍品之一。

龙被是黎族织锦艺术之精品。它是黎锦中的一种,是黎族在纺、织、染、绣四大工艺过程中难度最大,文化品位最高,技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。

龙被有五种形式,分别为:单幅龙被、双联幅龙被、三联幅龙被、四联幅龙被、五联幅龙被。其中,三联幅龙被居多,五联幅和单幅最少。龙被的花纹图案色彩不同,用途也不一样,红色多用于喜事,蓝黑色多用在白事或宗教仪式上。

龙被是黎族传统文化的载体,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值。它不但记载了



历史,更承载了黎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(杨道 辑)

在古代,一些历史名人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,他们严谨治家,在子女教育和行为规范上,可谓沥尽心血,值得今人借鉴。

三国时期,曹操严格教育孩子,有针对性地为其选择老师,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深明法度。为从严治教,激励孩子们发愤学习,曹操颁布了《诸儿令》:“儿虽小时见爱,而长大能善,必用之,吾非有二言也。不但不私巨,儿子亦不欲有所私。”意思是说,儿子们小的时候,我都喜欢,但是长大了,我会量才而用,说到做到。对部下,我不偏心,对你们我也公正,唯才是举,最有才能的人,才配当我的接班人。曹操一道《诸儿令》,明示了唯才是用,不偏不倚的选人标准,对儿子们的管教之法甚是严厉而公正。

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有5个儿子,他像当年母亲对自己一样,对孩子教育非常严格。按说,岳飞有条件让孩子生活得好一些,但他却始终保持简朴作风,把余下来的钱充作军费。岳飞日常在家只穿麻布,不穿丝绸,平时饭菜很少有肉,而且规定儿子不得饮酒。岳飞常让儿子们读书之余从事农业劳动,告诫他们“稼穑艰难,不可不知也”。长子岳云12岁入伍,岳飞对其武艺操练要求十分严格。一次,岳云身披重铠,操练骑马,一时忘了地形,从山上狂奔而下,结果连人带马栽进壕沟。岳飞大怒,命令军士打100军棍。众将士求情,岳飞仍然不依,并说:“前驱大敌,亦如此耶!”在岳飞的严格管教下,岳云很快成长为一员勇将。

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,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、其子柳仲郢、其孙柳玭等皆至高官。柳公绰对子侄们要求十分严格,一到灾荒年月,家中虽储备甚足,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始终是一碟菜。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,对他们说:“你们爷爷在世的时候,曾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,不给肉吃,我们终身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!”柳公绰通过这种方法,教育子孙勤俭持家,勤学苦读。在长辈影响下,柳玭写下了《诫子弟书》和《柳氏序训》,集中体现了柳氏严厉家法的精髓。

曾国藩熟读古今历史,也看多了权臣子女的骄奢张扬,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其严格。他要求子侄对“看读写作”四字缺一不可,在多封书信里对儿子详谈如何做学问和做人,要求其保持简朴,举止稳重,言行谨慎。对于女儿,曾国藩也是严格要求,他曾亲手为媳妇和女儿们定了一张功课表,每天要做4件事。第一项是做饭,早饭后做小菜、点心、酒酱等;第二项是织布,上午要纺纱或者绩麻;第三项是女工,中饭后,要做刺绣之类;第四项是其他杂工:晚饭后要做鞋或缝衣,一直到二更才能收工。曾国藩怕她们不好好照办,还在书中特别说明,每个人“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、女鞋一只。吾回江宁后,当作一总验。”可见曾国藩治家之细之严苛。

走进历史,便走进了璀璨的文化。这些历史名人都古代严父,其严厉家法和严格管教子女之道经典而传神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